

中国脅威論は、20世紀50年代、特に岸信介内閣の時期に既に出現しました。また中国崩壊論もかなり前の時期に出てきました。しかし、何十年を経ても、中国は脅威にもなっていないし、崩壊もしていません。「中国脅威論」と「中国崩壊論」を吹聴する学者が少なくないですが、彼らは繰り返して、「これから中国は脅威になるだろう」「これから崩壊に陥るだろう」と学問研究を吹聴して主観的結論を下しました。半世紀前から言われ始めた言葉ですが、何回も「これから、これから」と言って、引き続き現実離れの予言を繰り返しております。

中国脅威論は、西洋中心主義とどのような関係があるのかと簡単に言うとしたら、中国が発展したら西洋中心主義を動揺させ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あるいは、西洋史上で何回もあった覇権争いが起こるかどうかと心配しています。中国の指導者と政府が繰り返し「覇を唱えない」と表明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中国は必ず西洋の覇権国家の道を歩むと盲信しております。

一部の中国論者が「平和台頭論」を論じたら、その「平和」という言葉が無視されて、「台頭」という言葉だけ突出され、しかも中国の台頭は、昔の西洋の覇権国家の道をたどるに違いないと信じられております。それは、やはり西洋中心主義との関係ですが、中国崩壊論もまた西洋中心・西洋優越主義とは無関係ではありません。

中国の発展過程で、いろいろな問題や歪みが発生しているのは事実です。未開の東洋、文明の西洋の観点を持っている人々は中国に対して優越する地位に立ち、自分自身の発展のプロセスに発生した諸問題を忘れて、ただ中国の発展のなかの問題をつかみ、これから中国は必ず崩壊するだろうと信じておりま

す。

東洋国家としての日本の一部の研究者が、一方は西洋中心・西洋優越主義に対して、アメリカから「日本異質論」と言われるほど、例えば『菊と刀』ですが、「日本異質論」と言われるほど受動的な受け身な立場に立っていますが、その場合には、日本と中国とともに自我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もう一方は、自分自身が「西側の一員」を強調して、中国を「他者」として、自ら進んで西洋中心・西洋優越主義の手伝いをして、自分を中国に対して優越する地位に立ち、中国研究を展開しているという問題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はまさに一種の「二重の身分」ではないのでしょうか。

それではもう時間ですから、もっと5つのポイントを指摘したかったのですが、3つの問題で終わります。

●—司会 それでは、南開大学の楊棟梁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楊棟梁 我想简单地谈一下读了加加美教授这篇论文之后的看法。我认为加加美教授这篇论文很系统地梳理了源自美国的地域研究发展史和战后日本地域研究的发展史，以及中国研究史，同时指出了不同时期地域研究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在这个基础上，加加美教授分析和评价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还有各种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对此也有人把这些理论称为后学。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就是提倡共同的态度性，要构建新的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这篇论文确实气势恢宏，读后很受启发。我想谈四点看法，有一些可能和前面的几位评论者有相似之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现代中国学研究什么问题，或者说研究内容的问题。这个好像在加加美的论文中没有重点论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加加美要谈的核心问题是共同态度性，

但是我想在我们探讨中国学研究的新范式的时候，最起码的一个问题是应该知道中国学应该研究什么，反过来说什么是中国学应该研究的。实际上我们也未必都很清楚，比如说我希望在加加美教授以后的研究中给我们谈一谈历史上一直都有的“汉学”研究，还有在日本颇有历史的东洋学研究，和我们要构筑的、将来要搞的中国学研究，或者说是现代中国学的研究，内容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它们应该是有关系的。那么，我想现代中国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宽的，笼统地说它至少涵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并且是一体的研究。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现代中国学研究方法的问题。这是加加美教授论文中谈得比较多的，特别是他在前两三个部分，即论文的前大部分追述了美国和日本这方面是怎样研究的，以及日本学界是怎样来看的。我想，正像日本的这些学者早就指出的那样，这个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简单地、各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场”，或者是简单的复合，显然不是那样的。而是应该融汇各种理论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处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纵轴和横轴上的各种问题，它应该是这样的，加加美教授已经很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我在提供的稿子里谈到了一个中国寓言故事即盲人摸象的问题。盲人只是摸到了象的一部分，他对所摸到的地方的描述并没有错，但是大象的整体形象却不是那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靠一个学科来描绘或者研究中国的时候，它不可能真正地、完整地把握中国。现代中国学应该是一种从历史空间到历史时间的、全方位的立体的研究。这就是说，当一个“中国学”的学者太难了，因为他必须具有多方面的、复合的知识，而我们现在常常是单一学科的，例如研究日本经济的，或者说是属于经济学的、或是历史学的、或是

政治学的。而我们说的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学的学者，应该具有复合的知识和能力，这个条件要求是很高的。

第三点，关于现代中国学研究的目的。加加美教授指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过去长期存在的国策研究的倾向非常强，我想这个分析也是非常尖锐的。那么，在中国，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看法，可能与加加美教授的认识不完全一样。作为一种学问，中国学它应该是一门学问了，做学问的目的到底应该是什么呢？因人而异，有的人做学问可能只是为了穷理，在中国就有不闻窗外事的学者，只想把某些问题搞清楚。还有一个经世致用的问题，这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所以做学问有两条路、两个目的，一种是为了穷理；另一种是为现实服务，搞学问为现代、为今后服务，就是有这样的。如果一定说这两种中间哪一种是最好的，那么这种争论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我们随便下结论说哪一个更好，我没能力评论，因为中国上千年来就争论这样的问题，见仁见智。这个问题在我们现在讨论中国学目的的时候是应该考虑的。我认为纯理性的学问和经世致用性的学问是与生俱来的一对双胞胎，一定要说这个更好，那个不能要，大概有的时候我们主观上想把它分开以便客观上接近科学，希望是那样，但是很难。有时我也在想，做纯粹的学问，自己没有一种前提性的主观价值去搞学问的，搞出来的结果也未见得客观，因为研究者也会受到材料等各种局限。反过来说，经世致用的，为我们以后的实践服务的，带着这样的一些目的来搞学问的，未必见得他没有学问，他可能也是一位大学者，比如中国近代的梁启超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所以在我们考虑中国学的目的的时候，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恐怕还是要好好深入地讨论。

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加加美教授提出来的共同态度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认

为他提出的三点问题很有价值。所谓共同态度，按照我的理解，它是一种立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出发点，一种指导思想，一种意识或价值取向。这种观点对我们搞中国学的也好，国别学的也好，都非常重要。当然国别学的范围很宽了。我本人主要是做日本研究的，当然就涉及到中国也有一个日本学的问题，也要构筑，所以这篇论文对我的启迪非常之大。我完全赞成加加美教授文章里提示的三个前提，这三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我想说，按照加加美教授的这样一个建议，发达国家不能搞一种居高临下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反过来也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或者反过来说是从属性的态度来研究发达国家。我就讲这些吧，谢谢！

●—司会 それで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の陳東林先生にお願いします。

●—陳東林 加加美光行教授の論文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课题，就是克服现代中国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倾向，加强共性研究。加加美教授是从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历史回顾提出的，而我们中国学者作为现代中国学的本体，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回顾和考察，我认为也是很有意义的。加加美教授的论文用四分之三的篇幅进行了美国和日本的现代中国学走过的路，那么在中国应不应该叫现代中国学，或者叫当代中国学，我不敢下定论，但是我认为可以以加加美教授的回顾作为一个主线，回顾一下在中国国内现代中国学研究走过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国内的中国问题研究，也可以叫做当代中国学研究，实际上是和政治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加加美教授所说的国策性。而毛泽东的地域观念，指导着这种研究的走向。详细的内容在我的论文中有，这里就不详细讲了，那么我讲的是在80年代以前，在中国国内的中国问题研究，基本上是国策研究，或者说是一种国家任

务，它属于官方的一种领域。当时的中国国内问题研究机构比较少，我所知道的比如有中央党校、外交部、总参谋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等少数的机构，基本上是从一种为官方政策服务的配合工作，比如说像“九评”的文章就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随着中苏大论战的进行，这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实际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精神领域的争夺战。在意识形态上，于是出现了反东方主义的极端倾向，也就是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中宣传中国是革命的中心，以对抗美国、苏联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这种中国中心的论断，与其说是真正地相信中国会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不如说是用来对抗“东方主义”即美苏霸权主义的。而在历史学界、在意识形态上树立的东方主义的大旗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在70年代，苏联的齐赫文斯基院士编写了反对中国共产党路线的《中国近代史》，以及当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最多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写了一系列带有严重政治色彩的宣传品，意思是说中国背离了苏联的东方中心。那么中国方面，也在学术上进行了反东方主义的反击，比如中国方面组织编写了《美国侵华史》，然后又组织编写了《沙俄侵华史》。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因为70年代中国的政策是联合第二世界日本，出于这种需要，对于侵略中国最严重的日本却迟迟没有写出《日本侵华史》。所以在当时的反东方主义的国策性质的教育下，这种客观性是服务政治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在当今中国国内，我认为仍然可以找到东方主义和反东方主义两种形态的遗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复活，一种是以西方中国学研究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复活中国革命中心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脱离国策性的独立研究思考，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潮流，甚至出现了民间的中国问题研究者。